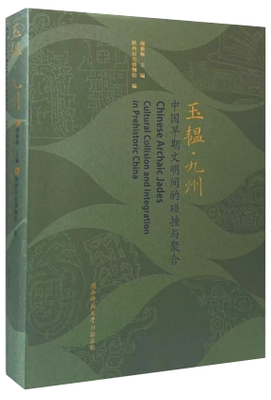
“玉”你共看“何以中国”

——评《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

刘云辉



翻开陕西历史博物馆新近编著出版的《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下简称《玉韫·九州》),笔者不禁欣喜:这是近二十年来少有的、以距今一万年至四千年之间制作的出土玉器为叙事切入点,集学术研究性、艺术鉴赏性为一体的重磅力作。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深化,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图景愈发清晰。那么,在万年以前,我们的先民过着怎样的生活?从哪个角度可以走进“古国时代”?笔者以为,玉器是非常合适的切入点。

解读中华民族传承万年文化基因 新石器时代,在日复一日打磨石头的劳作中,人们偶然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石头:它们更坚韧、致密,也更漂亮,它们无法像普通石头那样被打磨。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勤劳智慧的先民用“它山之石”,加上湿砂,以砂绳、木棒、骨头等工具,经过切割、钻孔、打磨抛光等一系列复杂工序,雕琢出质地温润细腻,光泽柔和,令人赏心悦目的玉器。

考古工作者迄今已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发现玦、管、环、璧、斧、珠等各类玉器140余件,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玉器组合。小南山遗址距今9000多年,而其玉器的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这说明玉器开始制作的时间应更早。到了距今8000年左右,兴隆洼查海文化的玉器工艺更加精湛。这不仅意味着,过去的1000多年中,制玉工艺有了发展、进步,更意味着当时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分工。发现、制作并无实际生产功能而有精神作用的玉器,反映出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不仅发生了技术革命,也意味着观念形态的进步。

古代先民笃信万物有灵,玉为天地山川之精英,可与天地神灵对话沟通。而制作玉器则需要特殊技能,要耗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制成的器物自然承载着极其珍贵的价值。所以,八九千年前的先民制作的环状玉玦,只能是少数地位特殊的人才能戴在耳上,借由它通灵通神,避除不祥,给人们带来吉祥与平安。制作的斧、凿、匕、刀等工具类的玉器,也并不在实际生活中使用,只在特殊礼仪活动中扮演着特殊角色。

从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的屈家岭文化,陇右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陕西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都已经有了成组玉礼器出现,是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社会复杂化的反映,也是社会进入区域性早期文明国家门槛的标志。

到了距今4300年左右,由于外部自然环境、社会内部变化等原因,盛极一时的区域文明相继衰变,但更大区域范围内,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趋势已然明显,中原地区的文明兼收并蓄,形成了“早期中国”。

在此过程中,区域文明间大范围、长时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最终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认知,而这些共同认知又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的运转秩序,玉器的作用也从“沟通神灵”,慢慢转变为“礼仪万邦”,这些认知和观念我们都可以在玉器上找到线索。

由此可见,史前玉器在中华文明形成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即使进入了历史时期,玉器仍然在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囿于篇幅,笔者在这里只能简单介绍,但这是《玉韫·九州》“展览巡礼”部分的叙述重点。首先为读者呈现出距今5500年至4300年的古国时代早期,“玉华四方”的图景,即玉器在不同区域的分布和传承,在不同时空下的交流与互动。其次,选取古国时代早期的红山、良渚,和距今4300年之后古国时代晚期的陶寺、石峁四个典型遗址,“分析了每个遗址的社会复杂化,以及玉器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独特、重要的作用”。最后,展现了玉器蕴含的祭天、崇祖、尊王这“礼之三本”。

展览配套图书的新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虽然是“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展”(后简称为“展览”)配套图书,却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图录”。

展览精选16个省市自治区48家文博单位450件展品,呈现以“九州韫玉山辉水润,华夏文明玉汝于成”的宏大主题。展览入选了由国家文物局、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央网信办共同主办的2023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

传统“图录”是以图为主,目前最常见的做法是将展线上的代表性文物收入书中。而《玉韫·九州》不仅收录了大部分上展文物,而且为了突显主题,还收录了部分因“档期”或其他原因未能参展的相关代表性文物,从而使本图录收录的文物达到340件(组)。同时,对重点文物或细节放大或多角度呈现,多达400余幅的高清文物图片可以弥补线下观展因“距离”“角度”等原因留下的遗憾。

《玉韫·九州》全书67万余字,由策展人总括性序言、学术专文、展览巡礼、玉器文献目录四部分构成。特别是邀请业内专家撰写学术专文,以拓展读者对史前玉文化在深度、广度和高度上的进一步认识。仅这一部分就有近19万字,这应该是本书最大的亮点。

学术专文共6篇,分别对应展览的不同章节,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聚焦中华文明起源,挖掘史前玉器文化深邃内涵,阐述玉器在早期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专文的作者都是研究中国史前玉器的顶级专家,多数长期在一线从事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对史前玉器的研究认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学术界主流观点,有些观点甚至是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刘国祥先生对红山文化玉礼制的探讨,刘斌先生对良渚文化玉器神灵信仰和玉雕艺术的研究,高江涛先生等对陶寺文化早期玉石器的分析,孙周勇先生对石峁文化玉器的解读,邓聪先生等对芦山峁发现的两件玉琮的分析。特别是邓淑苹女士的《曙光中的天人对话——中国玉礼制的史前探源》完全称得上是一篇宏文巨著,她在文中深度且系统地分析了史前玉器在中国传统礼制文明起源和发展中的奠基作用。

笔者以为,《玉韫·九州》发挥传统纸媒的特点和优势,不仅全面反映了展览内容,又增加了比展览更深入、细致、详备的相关内容,承担起打造“永不落幕的展览”功能。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其装帧以及玉器照片的质感也堪称一流。同时,为满足不同读者需求,图书在明显部位还标注了二维码,以链接展览数字展的强大资源。总而言之,这本图录不仅能满足广大读者了解中华文明起源、认识“早期中国”的需求,也为“中华文明探源”工作深入、持续地开展及成果转化,起到了阶段性总结、示范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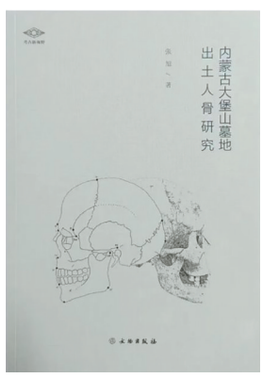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中国玉文化研究会、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

《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
编著:陕西历史博物馆
主编:庞雅妮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人骨考古从业者的心中有数

——评《内蒙古大堡山墓地出土人骨研究》

聂颖



我国的人骨考古学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近百年的学科发展,关于古代人群种系源流的探索一直是我国人骨考古工作者们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古代人类骨骼所反映出的健康状况、行为方式、生业模式等方面也被学界广泛讨论。作为一名人骨考古从业者,张旭博士对上述问题一直积极关注。2022年底,他的博士论文《内蒙古大堡山墓地出土人骨研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通俗地向读者展示了我国传统人骨考古学研究的标准路径,同时对人骨考古学研究的不足进行了反思,充分展现了我国人骨考古从业者的心中有数。

从书中能看到张旭博士在文献资料梳理、研究方法创新、学科发展反思等方面所下的功夫。该书将生物距离研究、古人口学研究、古病理学研究、骨化学分析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大堡山墓地出土不同墓向的人骨材料进行综合性探索。特别是对该墓地的人种构成、种系来源与流向、所代表的人种类型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同时,该书以骨骼研究为切入点比较分析了我国北方地区不同生业模式下的人口结构以及疾病出现规律,进而得出大堡山墓地古代居民的食物结构、健康状况、生业模式、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推论。

或许正是由于张旭博士对学科的反思和力求创新的精神,使得该书没有因研究对象的保存情况欠佳、所属遗址的考古学意义不够重要而沦为一篇中规中矩的学位论文。他秉持着将个案放在区域研究语境下的原则,努力在范式化的研究结论中寻求细微突破。该书对于人骨考古学研究领域普遍认可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人群的构成情况进行重新审视,在科学提取数据的基础上,提出该区域原住民与中原移民存在着一定的基因交流,并得到了考古学研究的证实——正如曹建恩先生在《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农牧融合现象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到的“为达到控制对方从而形成和平统治的目的,赵国有组织的移民与牧业人群杂居错处甚至相互通婚”。但由于张旭博士论文完成于2015年,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一些重要节点上的遗址发掘报告或简报,特别是人骨数据并未公布,该书在系统论述该区域人群交流、融合与互动方面略有力不从心,这也是张旭博士在文中再三强调的重要遗憾。

提到遗憾,该书在生物距离方面仍然沿用了人骨考古学常用的欧氏距离系数,并没有使用其他生物距离计算方法进行综合评估,但好在所得结论有古DNA分析结果加以佐证。该书在性别鉴定方面也借鉴了古DNA分析结果,规避了肉眼观察造成错误鉴定的风险,确保了性别鉴定的精准度,为他后续研究打下了可信的数据基础。书中类似这样的“借鉴”还包括利用同位素分析方法结合古病理学观察来对该人群的生业模式进行探讨,如今这些研究思路与视角在人骨考古学研究中已成为固定模式,正如吉林大学朱泓教授在推荐意见中写到的“该书有助于阅读者全面了解生物考古学最新研究动态,全面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知识体系”。而该书另一位推荐者是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潘其风研究员,他对张旭博士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期待在此基础上能够进一步取得更加科学、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字里行间彰显了先生对后辈的提携与关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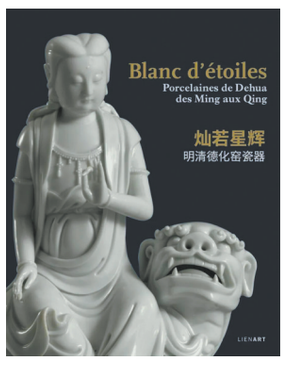
作为一篇博士论文,《内蒙古大堡山墓地出土人骨研究》不仅弥补了长久以来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人骨研究的不足,还为探寻该区域内人群迁徙与民族交融等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因此最终获得了吉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为一部专著,而非教科书,虽然受众不是需要接受教育的群体,但该书却在每项研究中都提出了目前该项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局限,在科学普及传统人骨考古基本知识的同时,也为未来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借鉴。而书中尤有未尽之处,也必将会让读者对他后续的研究更加抱以期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大堡山墓地出土人骨研究》
作者:张旭
出版单位: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评《灿若星辉——明清德化窑瓷器》

Claire Déléry (译)郑永松 虞睿博



抛开经济因素,如何让艺术保持活力?这个问题与每位艺术家的创作息息相关,甚至已经成为生活中老生常谈的话题。同样,这也是苏清河收藏大量德化古瓷的初衷。他的收藏,为德化这座城市的现代陶瓷工业生产提供了灵感来源。

这本图录收录的文章记录了这位陶瓷雕塑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历程。他所面对的是传统社会在二十世纪遭遇的诸多难题:手工艺大师的创作面临着来自工业化生产的冲击;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转型的困境;以及手工艺失传对经济的影响和由此催生的文化遗产危机。

与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文物的收集、博物馆的建立、口头或书面档案的整理、对手工艺重要性的考量及传播,已成为中国保持自身文化特征的一种方式。那么,如何利用传统手工艺优势,并将其转化为经济层面可持续发展的优质工艺品?这一思考显然又将我们带回到有关艺术本体活力的命题。

苏清河(1941-2012)在他生前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回顾了他收集德化古瓷的岁月,并努力为他所在城市的手工业发展指引方向。他的儿子苏友德也回忆了父亲的经历。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本图录旨在从技术和艺术的角度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德化古瓷,为中国这一最成功的传统手工艺的历史和技术知识发展做出贡献。

正如苏清河所说,德化瓷是物质、技术、文化和艺术结合的无与伦比的成果。其制作材料(极高纯度的硅酸铝)可直接在当地获得,经过完美的烧制能够转化为白色、高度玻璃化且半透明的瓷器。与景德镇瓷器作坊擅于轮制不同,德化制坯泥料偏软,故而通过轮制成型的难度较大,这也促使德化艺人专精雕塑和模制技艺。

德化艺人从明代起,便大量烧制宗教造像,因此也成就了这座城市特有的视觉形象。苏清河认为德化优雅的古瓷塑像主要是通过“随风摇曳”的衣纹营造出来的——他将这一感悟融汇到他在1970年代创作的《美猴王三打白骨精》中。

二十世纪形成的私人收藏对德化瓷的研究至关重要,如藏家帕特里克·唐纳利(Patrick Donnelly)于1969年出版的《中国白·福建德化瓷》。这本书首次全面展示了德化这座城市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唐纳利的朋友帕梅拉·希克利(Pamela Hickley)和她的丈夫以同样的热情构建了他们的收藏,该系列收藏后来由柯玫瑰(Rose Kerr)和约翰·艾尔(John Ayers)集结成册,于2002年出版。书中的藏品现藏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这本图录希望延续这一传统,以展示一部分苏清河的精美藏品。

德化瓷器的收藏史与全球贸易紧密相关,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纪。大量德化瓷通过海运输送至东南亚、日本、中东和欧洲等地,这其中除白瓷外也不乏青花。而德化陶瓷博物馆陈丽芳女士在她的文章中重点介绍的,正是这种在欧洲鲜有人知的德化青花瓷。

那些最负盛名和最古老的收藏,比如形成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的英国王室玛丽二世女王(1662-1694)、勃兰登堡同盟家族、波兰国王和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大帝(1670-1733)的收藏,都见证了欧洲贵族对中国瓷器,特别是德化白瓷的热情。这些收藏现已广为人知,它们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欧洲的瓷器收藏,同时对德化瓷器的断代也有很大的助益。

直到十八世纪,欧洲还无法生产瓷器。与厚重晦暗的欧洲陶器相比,细腻洁白的德化瓷器毋庸置疑会受到欧洲人的青睐。收藏是推动第一批欧洲瓷器生产研究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奥古斯都大帝和他对麦森瓷器厂的大力赞助,麦森才于1709年在欧洲制造出了第一批瓷器,其中有一部分作品还模仿了十七世纪德化窑的镂空瓷。而一个世纪以后,这样的故事再次上演:正如安托万·达勒比斯(Antoine d´Albis)向我们展示的那样,法国国家陶瓷博物馆中收藏的德化镂空茶具又赋予了塞弗尔瓷器制造厂新的创作灵感。

苏清河的德化古瓷收藏启发了这座城市的手工艺人,更开启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一场关键性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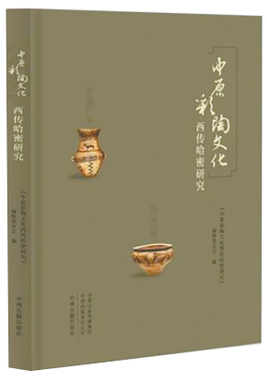
(文:Claire Déléry,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策展人,中国典藏部负责人;译:郑永松,法国国立艺术史青年研究员、法国索邦大学艺术史博士研究生,虞睿博,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博士研究生)

《灿若星辉——明清德化窑瓷器》(中法双语)
主编:郑永松
出版社: Editions Lienart(法国巴黎)
出版时间:2022年

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

——评《中原彩陶文化西传哈密研究》

刘琳



中国彩陶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图案丰富,谱系繁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中国彩陶遗存大规模地被发现,形成了各地独特的彩陶文化。比如,形成了以河南、山西、陕西为中心的大中原仰韶彩陶文化圈,以甘肃、青海地区为中心的马家窑彩陶艺术圈,在北方燕山辽宁、内蒙古一带则形成了红山文化彩陶艺术圈,东方则有以山东、江苏为中心形成的大汶口文化彩陶艺术圈,南方则有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形成的跨湖桥文化、白家文化、大溪文化彩陶艺术圈。其中,中原仰韶文化彩陶艺术与马家窑文化彩陶艺术渊源深厚,近年的考古发掘地层关系证明,它们在时间上有清晰的先后关系,而在西北的新疆哈密、伊犁河流域等地,又发现了与马家窑彩陶艺术关系密切的彩陶遗物,可见其清晰的传播路线。中州古籍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中原彩陶文化西传哈密研究》一书,详细记述了中原早期彩陶艺术传播至马家窑后,又继续西传至哈密的过程,对这一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彩陶艺术经过哈密后在中亚、西亚地区的传播做了考察。本书的研究追踪了彩陶艺术的传播路线,探寻了华夏文明的传承绵延,填补了仰韶文化在新疆地区研究的空白,为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提供实证资料。

辉煌灿烂、匠心独具:中原地区的彩陶艺术 中原地区主要是指我国中部、黄河中游的地区,大体范围为:北靠太行山,西依伏牛山,南临桐柏山和大别山,东向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即河南省的大部。这里大面积的黄土坡地,数以千计的河流冲积形成多个台地和河流三角洲,疏松的土壤结构、肥沃的冲积平原,十分便于开垦、耕作。因此,在遥远的史前时期,人类的祖先就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发展农业生产,进行艺术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至迟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原地区已经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从1921年安特生等人的调查至今,河南已经调查出3000多处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地域遍及全省各地,尤其以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地最为集中,展示了中原地区史前社会的繁荣景象。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是以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命名的,已经发现有少量的彩陶;而被人称道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则是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命名的。仰韶文化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根植于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一支强大的彩陶文化。本书中详细记述了中原地区彩陶艺术的发现与研究过程、中原地区彩陶艺术的兴衰、中原地区彩陶艺术的特征等,还将庙底沟彩陶艺术、洛阳彩陶艺术、郑州大河村彩陶艺术、安阳后冈遗址彩陶艺术等进行详细叙述,为读者展示了辉煌灿烂、匠心独具的中原彩陶艺术。

革故鼎新、衔接有序:关中地区、甘青地区的彩陶艺术 关中地区是中国彩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重要的彩陶文化聚集区。关中地区南依秦岭山脉,渭河穿行而过,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关中地区厚重的历史文化。就像王炜林、孙周勇所讲:以渭河流域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是中国彩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早在8000年前,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就已经出现彩陶,此后长达3000多年的发展历程,孕育了中国史前彩陶最辉煌的两个时代——半坡时代和庙底沟时代,缔造了史前中国最独特的彩陶文化圈,为文化意义上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老官台文化彩陶的发现,不仅证明了中国彩陶源起本土,而且还为其后黄河中游地区彩陶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在仰韶文化晚期,以关中为中心的文化逐渐西移很可能是导致马家窑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陕西关中地区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分布着众多遗址,本书中有详细的介绍,如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高陵杨官寨等,它们都是仰韶文化的代表。关中地区彩陶的发现与研究过程、关中地区彩陶艺术的发展脉络、关中彩陶的艺术特征与文化意义,书中有详细的探讨。

甘肃、青海地区位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要道,亦是中国史前文明的发源地之一。20世纪20年代开始,甘肃、青海史前古墓中陆续发现彩陶,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百年来,甘青地区发现数以万计的造型优美别致、花纹绚丽多样的彩陶,经考古学家的研究,认为其分别属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稍晚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本书对甘青地区彩陶的发现与研究过程进行详细的叙述,对甘青地区彩陶艺术的发展脉络进行详细的梳理,最终得出结论:在甘肃河西走廊,马厂类型通过“过渡遗存”演变为四坝文化,并将彩陶这种文化特质全盘移植到四坝文化之中。随着四坝文化的继续西迁,又将彩陶这一文化特质引入新疆东部地区,对那里的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融汇东西、向西远播:新疆地区、新疆以西中西亚地区的彩陶艺术 “新疆地区的彩陶”主要是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范围内出土的古代彩陶艺术品。这个区域位于河西走廊以西,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以东,南西伯利亚以南,帕米尔高原中部以北。新疆发掘的彩陶遗址,主要分布在这些广阔的范围之内。新疆地区的考古发掘表明,距今11000-10000年,新疆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的迹象。在距今两三千年前,天山南北区域,如哈密的三道岭、七角井以及伊犁、奇台、库车、巴楚等地都已经出现人类活动遗迹,其石器形制、刻画技艺以及陶器的纹饰、器形等与甘肃、内蒙古、宁夏甚至河南等地相近,可见,内地彩陶艺术在早期就已经传播并影响到新疆地区彩陶艺术文化的发展和流变。西亚的陶器在近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其不仅风格独特,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中西亚主要发现的彩陶文化有耶莫彩陶文化、萨马拉彩陶文化、哈拉夫彩陶文化、欧贝德彩陶文化等,诸多文化遗址都出土了丰富的彩陶艺术品,尤其是哈拉夫彩陶中的花瓣纹、鸟纹的造型和中原地区的庙底沟彩陶纹样、临汝阎村彩陶缸的纹样极为相似,可能是中外早期文化交流的结果。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我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起源是由彩陶和瓦鬲开始的。”本书将彩陶文化西传哈密之路进行系统的研究,对边疆地区的艺术文化进行系统考察,这对我们研究文化的起源、文明的传播意义非凡。作为新疆东大门的哈密,东接甘青地区,西靠新疆和中亚地区,北连欧亚草原的内蒙古高原,南与横断山区和青藏高原相连,历来是各种文化交流、碰撞的舞台,各地不同文化因素也借此通道传播至其他地方,成为我国与欧亚大陆、中亚文化交会的缓冲地带和交通要道。哈密一方面输送着西域文化向中原文化挺进,一方面要把中原文化接过来,送进西域绿洲。正是这种开放性,哈密彩陶才有了多种文化的元素。

远在彩陶艺术所代表的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传承创新已经广为存在,从所涉及的区域看,以哈密为代表的新疆地区已经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彩陶艺术也是证明华夏民族一体格局形成的较早实物资料。从彩陶的传播轨迹看,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与陕西半坡、临潼姜寨,到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再西传至哈密地区乃至更西的西亚地区,都存在着彩陶艺术的交流,和汉代时期的丝绸之路有着类似的路线,也说明了早在青铜时代,可能就存在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途径,即“彩陶之路”。

《中原彩陶文化西传哈密研究》
编著:《中原彩陶文化西传哈密研究》编辑委员会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